

失地农民的心理场及其重构

——基于“仙居雅苑”安置社区的个案研究

于浩淼 陈绍军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失地农民的心理变化不仅仅是结构性的,也是过程式的。心理的结构性变化侧重反映失地农民心理内容,心理的动态过程反映的是失地农民心理场的“移位”。

关键词 失地农民 心理场 刻板印象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2-0041-06

一、主题和文献回顾

到2006年底我国因城市化而导致的失地农民已经上升到4500万以上。庞大的特殊群体会直面生活压力,生产体系被破坏,工作机会、土地和资产丧失,卫生服务状况恶化,亲属关系团体和非正式社会互助网络被拆散,生产及服务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遭破坏^[1],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已有的失地农民研究中,大体可以归纳为3个研究领域: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征地与郊区农村城市化研究、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大部分关注失地农民的物质损失和制度化因素。近两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另外一个路径研究失地农民,即心理研究。心理研究的路径包括两个:失地农民“心理适应的过程研究”和“心理特点研究”。

1.“心理适应过程”的视角

柴小华等人对失地农民的研究是将心理看作“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两个阶段:一是征地阶段,二是“市民化”阶段。他们认为,农民的心理是对征地政策、征地方式的回应,心理调整是辅助性的,但心理作用在市民化过程中又至关重要。市民化是人的“城市化”,必须将之纳入城市化体系。他们建议:①失地农民要从意识层面认同目前身份;②失地农民要按照城市工作要求获取职业技能;③失地农民要改变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适应城市^[2]。

也有学者从失地农民身上寻找问题。韩承鹏等人认为,失地农民受自身素质限制导致适应不足,如不良生活习惯、职业技能不足、旧观念等。他们承认

活动场景变换对失地农民心理适应有影响,但归根结蒂是失地农民本身存在问题。该研究过多关注失地农民自身不利的内容,如农民不讲卫生的毛病,小农意识严重。这些提法本身值得商榷,韩承鹏等人也没有提出案例来证实^[3]。

张海波、童星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失地农民的第一手资料,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他们提出,失地农民的心理认同是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虽然政策上认定其是城市居民,他们也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还没有达到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没有到位,就业不理想,他们还没有彻底认同周围环境。张海波等人提出,要针对这些问题具体解决,使失地农民从心理认同城市生活^[4]。

2.“心理特点”的视角

有些学者认为,心理现象在某一个阶段是静态的,如果将静态心理现象进行“采样”分析,研究会更加具体。

张传华等人在调查分析重庆市失地农民后,认为失地农民生活困难会导致一些心理特征:趋避冲突、不满情绪、感染与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失地农民一方面认为土地出让可以获利,另一方面由于年龄、劳动技能等原因不愿出让土地。一旦补偿较低或者出现其他问题,“不满”会被激发出来,有的可能形成群体事件甚至上访^[5]。

王国林认为,不同年龄群体对出让土地持不同态度。愿意出让土地的一般是青年人,他们有技能从事非农工作,或者需要土地换取现金,少数年老者因为务农时间长而厌倦。40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一般拒绝出让

土地 ,他们对土地感情深厚 ,出来后工作无着落^[6]。

综上所述 ,关于失地农民心理状况的研究视角各异 ,但以童星、张海波、郁晓辉等人的社会认同研究最为突出。他们将“ 社会认同 ”的概念引入到失地农民心理适应的研究中来 ,认为社会认同是衡量个体融入主体社会程度的重要维度 ,用认同的视角可以很好地沟通微观与宏观 ,个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7]。这个视角为我们探讨失地农民的心理问题提供启示。

但是 ,失地农民的心理现象不是从无到有的认同过程 ,严格说来是从“ 原有 ”到“ 破裂 ”再到“ 重建 ”的过程。两个分析路径的差别在于 ,前者是从零到 B 群体 ,后者是从 A 群体到 B 群体。“ 场 ”理论认为 ,任何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 场 ”中存在 ,并且一切社会过程的最初起源都必须从这个场的构成中去寻找 ;“ 场 ”即是社会事物的整体内环境^[8]。失地农民的“ 场 ”是从 A 到 B 的变化过程 ,事实上 ,A(农村社区)与 B(城市社区)的两个场域存在差异 ,结构不相同 ,产生的社会事物及由此而形成的“ 社会心理 ”必然也会出现变异。这从理论上解释了失地农民在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心理应变。问题在于 “ 刻板印象 ”(个体根据自然和社会特征将他人分类 ,并建构起来的固定和系统的观念)会阻碍心理过渡^{[9][9]}。社会心理学认为 “ 刻板印象 ”是客观存在 ,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在失地农民心理问题中 ,产生刻板印象的主体不仅仅有失地农民 ,还有失地农民的外部群体——同社区的原居民。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失地农民和城市原居民。本文希望通过考察两个群体的互动状况及由此而产生的双方心理机制 ,来解答本文的问题。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1. 假设的提出

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都会在群体互动中产生和发生改变 ,甚至还会引起对方的改变 ,这是“ 场 ”理论的假设前提。基于文献回顾和上述分析 ,本文的中心假设是 :失地农民的社会情境发生重组 ,由此产生“ 失地农民心理场 ”,而“ 刻板印象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对抗融合是心理场变化的外部特征。

假设 1 :失地农民从农村社区迁出后 ,旧的生活方式解体 ,出现“ 失地农民心理场 ”。农民身份赋予的生活方式和朋辈关系在社会情境改变后 ,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环境。农民原有的心理结构开始解体 ,并且形成了特殊的失地农民心理场。

假设 2 :在失地农民心理场中 ,有冲突 ,也有融合。总体上 ,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是慢慢融合的 ,但是由于刻板印象存在 ,双方暂时缺乏互信和互适。

2. 概念操作化和研究方法

“ 心理场 ”由 Kurt Lewin 提出 ,是指个体所处的心理生活空间 ,它是一个动态整体 ,动力是心理力量^[10]。失地农民的“ 心理场 ”就是在外部环境刺激作用下 ,失地农民心理认知形成的、特定的心理空间或结构 ,这个空间或结构随外部刺激的变化而变化 ,并指导着失地农民的实践行动。从这个意义看 ,失地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建立在心理场基础上的。由于概念的抽象性 ,本研究在访谈调查中进一步设计了“ 外部刺激 ”、“ 角色认定 ”、“ 归属群体的认定 ”和“ 角色实践 ”等几个维度 ,在此基础上设计多个指标进行测量。

本研究的方法以访谈法为主 ,结合文献法、观察法 ,分析采用访谈内容和已有研究的数据 ,定量与定性结合。

3.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南京市仙居雅苑失地农民安置社区。该社区原为城市居民的经济适用房 ,后改为安置当地失地农民 ,因此该社区有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两大群体。

仙居雅苑共 59 幢 ,每幢有 4 或 6 个单元 ,其中每单元 10 户。失地农民和居民并没有被隔离安排 ,而是混居。调查组在 2004 年 2 月份已经对该社区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① ,此次访谈调查仍采用“ 右手原则 ”,结合上次调查 ,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调查共完成 45 个访谈 ,其中 28 个“ 失地农民家庭 ”个案 ,17 个“ 城市居民家庭 ”个案。由于仙居雅苑仍然存在空单元 ,因此调查最初选择在居住最密集的 50 幢公寓。城市居民调查集中在 1 ~ 30 幢之间(因为 31 ~ 59 幢是后期为增加失地农民住户而扩建的 ,城居住户不多);失地农民访谈对象在 50 幢公寓随意抽取。

三、调查发现

1. 被访谈者的基本情况

表 1 被访谈者的年龄结构

年 龄	失地农民	城市居民	%
18 ~ 30	21.43	23.53	
31 ~ 40	17.86	23.53	
41 ~ 50	28.57	29.41	
51 ~ 60	17.86	11.76	
60 以上	14.29	11.76	

①南京师范大学 2003 年学生基金资助项目(2003xk028)关于江苏省失地农民调查(调查区域是徐州、苏州、南京、扬州 ,共 1011 个样本) ,在本文中采用的部分数据来源于此调查。

表 2 被访谈者的文化程度结构		%
文化程度	失地农民	城市居民
没有念过书	21.43	5.88
小学	25.00	17.65
初中	32.14	17.65
高中或中专	17.86	35.29
大专及以上	3.57	23.53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 ,两个被访谈群体在年龄结构上相差不大 ,但是在文化程度结构上差异显著 ,失地农民“ 小学 ”以及“ 没有念过书 ”占到 46.43% ,而城市居民是 23.53% ;失地农民文化程度在“ 高中及高中以上 ”为 21.43% ,而城市居民为 58.82%。文化程度的差异性对两个群体的行为(如再就业、职业培训等等)和心理(新生事物、文化的获得与接受程度)有可能产生影响。

2. 外部刺激

(1)工作

在失地农民“ 工作情况 ”的调查中发现 ,有“ 固定工作 ”的失地农民在失地后没有变化 ;“ 务农 ”的 14 人在征地后 ,14.29% 在安置社区旁边开辟荒地 ,种植蔬菜 ,21.43% 从事“ 搬运工、货运和家装建材等 ”,64.29% 完全失业(详见表 3)。失业率增加、打短工的比例增加(增加 10.72%)与失地农民的文化层次有很大关系 ,失地农民认为主要原因是“ 没有技能 ,文化程度低和年纪偏大 ”。相比之下 ,城市居民拥有“ 固定工作 ”的比例为 88.24% ,其他为退休工人 ,依靠“ 退休工资 ”生活。“ 失业 ”和“ 短工 ”已是失地农民的一个标志。

表 3 失地农民的工作结构		%
工作情况	征地前职业	征地后职业
务 农	50	7.14
固定工	7.14	7.14
打短工	28.57	39.29
没有工作	14.29	46.63

注 : 一年内连续工作时间超过 6 个月 “ 为固定工 ” ; 有工作 , 但工作时间不足 6 个月 “ 为短工 ”。

(2)住房

35.71% 的失地农民“ 对住房不满意 ”,原因是“ 面积小、不透气、房内格局不合理 ”,28.57% 的失地农民认为“ 住房一般 ”;“ 住房是城市的 ,安全但比较小 ,老人来往不方便 ”。访谈发现 ,失地农民家庭“ 原有的住房面积 ”平均为 199.44 m² ,而现在的住房平均只有 91.69 m²。空间落差使失地农民的满意度下降。

(3)邻里关系

调查发现 ,失地农民对现在邻里关系“ 比较满意

及以上 ”占 39.29% ;“ 不满意的 ”占 7.14% ;对以前的邻里关系“ 比较满意及以上 ”的占 96.43% ,有 1 人是“ 一般水平 ”。失地农民进入安置社区后对邻里关系的满意度下降 ,且幅度较大。

(4)收入来源

失地之前 ,少部分农民已从事非农工作 ,大部分还是农和工或农和商的兼业农民 ,小部分仍完全从事种植、养殖业。征地之后 ,土地被完全或大部分征收 ,对各类农民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调查发现 ,失地前家庭收入第一来源是“ 打工 ”的占 55.90% ,失地后这一比例上升到 73.90%。失地前有的农户的家庭收入第二来源是种庄稼 ,失地后 ,农户家庭收入的第二来源变成了安置费 ,且比例高达 46.50%^①。安置费是一次性支付 ,属临时性收入 ,反映出收入来源萎缩。

将经商作为收入来源第一、二位的比例并不大 ,在征地前后的变化也不大(失地前经商为第一、第二收入来源的占 4% 和 2.20% ,失地后占 3.50% 和 1.90%) ,因为失地农民掌握的资金属于“ 救命钱 ”,惧怕“ 经商 ”风险 ,宁可选择“ 打工 ”。

调查发现 ,75.00% 的被调查失地者认为外出务工(不管“ 固定工 ”或“ 短工 ”)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表明 ,失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中于务工 ,成为城市打工者 ,实际是失地农民“ 工作的市民化 ”。

(5)社会保障

土地是农民最根本的“ 保障 ”,按照“ 谁获益谁负责 ”的原则 ,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工作应由受益单位来承担 ,较合理的是帮失地农民购买社会保险。调查发现 ,除了 2 人有固定工作的失地者享有养老保险(来自工作)外 ,92.86% 都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25.00% 要“ 自己养老 ”,有 1 人想购买商业保险 ,2 人想参加但没有途径 ,其他人选择“ 子女养老 ”,在医疗保险上 ,有 46.43% 的人表示以前参加过合作医疗 ,但由于保障水平低、范围窄 ,不愿意继续参保 ,46.43% 没有参加过 ,原因是“ 合作医疗被村里赚钱 ”、“ 合作医疗没保障 ”、“ 无力参保 ”等等。失地者认为 ,城市社会保障优于农村 ,但他们没有受到“ 优惠 ”,社会保障是城市居民的标志 ;“ 最低生活保障 ”在失地农民中“ 知名度 ”并不高 ,在 2004 年的调查中显示有 75.40% 人“ 不知道低保 ”。失地农民由于接受了征地补偿金 ,就不能成为“ 低保户 ”了。

(6)生活环境

表 4 显示 ,在交通方面 ,50% 的失地农民认为比以前更差 ,32.15% 的失地农民认为改善了。这是因

①数据源于南京师范大学 2003 年学生基金资助项目(2003xk028) 关于江苏省失地农民调查 ”。

为 ,仙居雅苑坐落于山坳 ,在 2005 年 6 月以前的交通工具是“ 单程 (4 元)马自达/摩托车 +(1 元)公交车 ”,之后南京某公交公司在附近设置了公交搭乘点。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以往可以搭乘公交车 ,现在交通反而因新居偏僻变差 ;原本偏远的农民现在坐车进城 ,所以改善了交通条件。城市居民中 17.64% 的人认为 ,安排新的公交线路之后 ,交通改善 ;76.47% 的人认为“ 乘车人多 ,成分复杂 ”,交通环境改变不大 ;5.88% 的人认为交通环境其实变差 ,因为“ 小偷多了 ,不安全 ”了。在水电方面 ,多数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都认为没有改变 ,17.86% 失地农民认为“ 水质变差 ”,城市自来水味道重。在卫生方面 ,53.57% 的失地农民认为改善 ,21.43% 认为没有变化 ;25.00% 认为变差 ;“ 垃圾到处都是 ”、“ 其他人不讲卫生 ,乱扔垃圾 ”,88.24% 的城市居民认为 ;“ 失地农民来后卫生环境急剧下降 ”,只有 11.76% 认为“ 卫生没有改变 ”。

表 4 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对于安置社区环境的评价 %

评价	交通		水		电		卫生	
	失地农民	城市居民	失地农民	城市居民	失地农民	城市居民	失地农民	城市居民
很大改善	14.29	0	7.14	0	3.57	0	10.71	0
略有改善	17.86	17.64	21.43	5.88	21.43	0	42.86	0
无变化	17.86	76.47	53.57	94.12	71.43	100	21.43	11.76
更差	50.00	5.88	17.86	0	3.57	0	25.00	88.24

3. 身份认定和归属群体认定

“ 农转非 ”政策认定 ,进入城市社区的失地农民具有城市身份 ,但调查显示 ,只有 39.29% 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人口 ,46.43% 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 ,其他人“ 说不清 ”。城市居民中 ,23.53% 认为“ 失地农民已是城市人 ”,58.82% 认为“ 他们还是农民 ”,其他人“ 说不清 ”。

对“ 失地农民交往群体 ”的调查显示 ,92.86% 选择“ 亲戚 ”、“ 以前的邻居 ,或者朋友 (同样是失地农民)”,其他人认为应该和城市居民多接触。交往方式上 ,78.57% 的人选择串门 ,10.71% 的人选择打电话 ,10.71% 的人选择“ 打牌或麻将 ,商量做生意等 ”。在回答“ 与城市居民是否有差别 ”的时候 ,92.86% 的人认为有比较大的差别 ,只是有“ 固定工作 ”的失地农民认为没有差别 ,认为有差别的原因主要是“ 无社保 ”、“ 无固定工作 ”、“ 没有技能且文化水平低 ”、“ 自己是属于农村的 ”等。

城市居民在社区中交往比较简单 ,64.71% 的人表示“ 很少出去和别人交往 ”、“ 很少和失地农民交往 ”,甚至有的人“ 有的失地农民比较危险 ”,29.41% 的人认为“ 会和对面邻居打招呼 ”、“ 和经常碰到的人打招呼 ”等。交往方式上 ,47.06% 的人表示“ 见面简

单寒暄 ”、“ 很少打电话 ”。城市居民认为 ,失地农民与自己的差别集中在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82.35% 的人认为“ 失地农民卫生观念不强 ”、“ 乱扔垃圾 ”、“ 工作不稳定 ”,也有个别人认为“ 失地农民在征地中获益 ”、“ 失地农民与自己没有多大差别 ”,只是“ 暂时性失业 ”。

4. 角色实践

调查显示 ,多数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互不认同 ,在追问“ 你认为自己会不会和城市居民一样 ? 如果不是是因为什么 ? ”时 ,失地农民中 14.29% 认为不会 ,主要是因为年龄较大 ,46.43% 认为会和城市居民一样生活 ;“ 有固定工作 ”、“ 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39.29% 表示不清楚 ;失地农民不抵触与城市居民交往 ,但是“ 看不惯城里人冷淡的样子 ,他们看不起人 ”,有 4 个老年失地农民表示“ 没想和他们交往 ”、“ 和他们没话说 ”、“ 更愿和老邻居交往 ”。

城市居民中 64.71% 认为 ;“ 失地农民比较乐于助人 ”、“ 不排斥与他们交往 ”,5.88% 表示“ 他们开了便利店 ,我们常去买东西 ”,5.88% 表示“ 不会和失地农民交往 ”,29.41% 表示“ 不清楚是否和他们交往 ”。41.18% 的城市居民认为 ;“ 失地农民不久会和城市居民一样 ”,5.88% 表示“ 他们已经是城市居民了 ”,23.53% 表示他们不会成为和自己一样的城市居民 (文化程度低 ,卫生意识差) ,29.41% 不清楚。“ 如果失地农民要成为城市居民 ”,他们需要做到“ 接受教育 ”、“ 有良好的工作和工作环境 ”、“ 生活方式改变 ”、“ 卫生意识加强 ”。

四、初步分析与探讨

任何事物都要在“ 场 ”中存在 ;“ 场 ”就是社会事物的整体内环境。“ 农村社区 ”显然不同于“ 城市社区 ”,失地农民从“ 农村 ”到“ 城市 ”的变迁必然要进行心理场“ 移位 ”。

处于特定心理场的人们 ,群体、行为和环境是相互作用的 ,而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人的心理事件和行为^[1] ,群体动力学用公式 $B = f(P, E)$ 来表达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 ,B 是指行为 ,P 是指人 ,E 是指环境。当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共同居住的社区处在两种群体的交换中 ,内环境就会发生彻底改变 ,P 和 E 都发生了变化 ,P 成为居民和失地农民的混合体 ,E 是包含复杂群体的社区 ,这样的复杂心理场在刻板印象下很容易产生互搏。

1. 独特的“ 失地农民心理场 ”:焦虑和徘徊

环境的变化对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由 E 指向 B)。失地农民的心理场结构与外部刺激是分不开的。失地之后 ,农民迅速失业 ,住房面积迅速

缩小,原来“独门独户”的具有保护隐私功能的“别墅”,变为居住紧密、实际距离小于心理距离的公寓;从“鸡犬相闻”、“胜似亲友”的乡邻群体中,转入到“铁将军邻居”的群体;收入来源从“以工为主,务农为辅”的多结构渠道到“务工唯一出路”的方式;从“土地保障”到“没后路”等等,都成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区后面临的问题,如图1。



图1 失地农民心理场

事实上,“天赋的”农民生活方式已经被“习惯”成“文化”。这些“天赋”随着“农民”身份的丧失而被迫丢弃。文化是有“惰性的”;“文化惰性”会延缓人们改进的步伐。失地农民还没有建立起新的生活秩序,焦虑而没有目标,原有的文化惯性会役使人们回到原来的生活秩序当中。在新社区周围开荒务农的失地农民就是例证。然而,环境、身份的改变是客观的,在进与退的两难和生活无着的焦虑中,形成了失地农民特殊的心理结构。

2.“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相对的,即彼此产生“刻板印象”。探讨刻板印象不仅要分析他人对个体的刻板印象影响,还要分析个体对自我刻板印象的影响。两种印象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动力因素,这是产生互搏的基础(如图2)。



图2 刻板印象造成的冲突

失地农民认为,“城市居民”意味着“稳定的工作”、“良好的社会保障”、“整洁的卫生条件”、“人际冷漠”。这些特征成为城市居民的标签,城市居民认为,失地农民“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社会保障”、“不讲卫生”、“没文化”、“比较热情”,这些是失地农民的标签。

不仅是“他人话语”,还要考察“自我”印象。笔者认为,在对彼此产生刻板印象的同时,失地农民和

城市居民也在给自己进行角色定位。调查显示,城市居民认同失地农民对他们的印象,而失地农民中部分人对标签提出异议,另外一部分人表示同意。这意味着,群体之间一定程度上认同差异,承认互相刻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刻板印象迫使群体之间产生隔离,并且互贴标签。但是,在一个社区中相互碰撞地生活,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分享资源的同时,两个群体在接触和交换中互相博弈,心理场以刻板印象和“抵触情绪”为特点。

3. 互搏表演:刻板印象对群体的行为影响

由公式 $B = f(P, E)$ 的结论看出,行为是受到心理场作用的,这个过程是通过整合群体和环境,形成动力机制,进而产生行为。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心理场在互相冲突下形成的特有机理,是建立在刻板印象基础上的,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来自于刻板印象。

印象管理理论认为,态度是行为的基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有影响作用^{[9][37]}。刻板印象的作用同样如此。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互相交往频率并不高,7.14%的失地农民认为应该和城市居民多接触,但并没有付诸行动;29.41%的城市居民表示会和任何人打交道,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张海波等人认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网络呈现同质性,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尚未建立是由于进城后他们忙于应付生计,这种观点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是冲突的^[41]。格氏认为,弱关系(异质性网络)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以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12],因此,如果从应付生计的角度,失地农民则更应该建立起异质性的社会网络。本文认为,失地农民没有建立起异质性网络更应该从群体的归属感来解释,刻板印象将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划分成有明显间隔、且“鲜有交换”的两个群体,这使得两个群体的成员要按照刻板印象赋予的特殊符号和规则行动,事实上,两套规则体系在共同的平台(安置社区)上进行交互,矛盾的碰撞形成了互搏的矛盾体系,正是矛盾体系制约着群体的行为。

4. 心理场的整合:群体的交融

目前来看,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相互交往较少。但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很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是可能的。除了老年失地农民不愿与城市居民发生关系,85.71%的失地农民均表示不排斥与城市居民的接触,64.71%的城市居民也不排除和失地者交往的可能。这些态度表明,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开始互相承认,有融合

的迹象。

心理场不仅仅是系统存在的复杂的心理关系网络,这个网络还与外部力量不断进行重组。群体动力学认为,心理场固有的内聚能力会将存在于场内的各个群体通过共同体归属气氛进行整合。从调查来看,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拥有不同的复杂的心理关系网络,这些心理关系是由长期的生活习惯和特有文化导致的,但是,随着城市化推进,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文化之间也在发生冲突、交融、同化,那种培育各自特性心理场的二元结构系统已经破裂,如今面对的就是两种心理场史无前例的碰撞,要么彻底决裂,要么走向融合。

彻底决裂对两者都不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两个群体,他们的环境是相同的,可以控制的社区资源是共享的,决裂对其自身的资源控制是有害的。人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一个群体不能脱离另一个群体而单独存在,也不能不考虑到决裂的成本—收益。因此,这种碰撞会加速其朝同一方向重组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M].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

心,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86.

[2] 柴小华,陈传锋,卢美芬.被征地农民对市民化的社会心理适应过程[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5(1):74.

[3] 韩承鹏,刘殿臣.提高失地进城农民的心理适应能力[J].农村经济,2005(9):119.

[4] 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2006(1):128-134.

[5] 张传华,邓凌,邱道持.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心理特点探析[J].农村经济,2005(9):116-118.

[6] 王国林.失地农民的心理调查[J].农业经济,2004(7):5-6.

[7] 郁晓辉,刘海波.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06(1):47.

[8] 张小军.社会场论[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84.

[9] 金盛华,张杰.当代社会心理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0] 库尔特·勒温.拓扑心理学[M].竺培梁,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1-16.

[11]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8.

[12] 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

[1] 迈克尔·M·塞尼.移民与发展[M].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

·简讯·

河海大学“重大水工混凝土结构隐患病害检测与健康诊断研究” 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的 2006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奖评选结果中,河海大学获得三项奖,其中由吴中如院士和顾冲时教授领衔的“重大水工混凝土结构隐患病害检测与健康诊断研究”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为了开发利用水资源和水能资源,我国共建有 8.4 万多座水库大坝,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经有关职能部门检查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大坝为病险坝,严重影响工程效益的发挥,威胁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重大水工混凝土结构隐患病害检测与健康诊断研究”项目首次提出并建立了水电工程隐患病害检测与健康诊断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本项目边研发边应用,部分成果已应用于新安江、龙羊峡等工程,取得了 2.12 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重大的社会效益,同时对其他工程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广泛的推广价值。经鉴定,该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重大水工混凝土结构智能系统、健康诊断理论和方法以及隐患病变预警系统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另外,河海大学主持或参与的“太湖河网区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技术及其应用”和“复杂潮汐河段苏通大桥桥位设计潮流研究”分别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

(本刊编辑部供稿)